

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从德国经验看中国的“全球性大国”之路

〔美〕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

一、历史的镜子：德国的崛起

1890年，英国的统治阶级在控制庞大的世界帝国的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大不列颠正在逐渐衰落。英国人担忧的不是实力仍然弱小的德国海军，也不是令人畏惧的德国陆军，更不是德国争夺殖民地的野心——当时可供征服的土地只剩下非洲的一些价值不大的地区，以及散落在遥远的太平洋上的小岛。对付德国海军扩张的办法无非是再建造几艘战列舰；对付德国陆军的办法就是同大陆保持距离——对于世界超级的海军霸权而言，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是轻而易举的。

聪明的德国人展现出自信的乐观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这些恰好是现实主义的英国人越来越感觉到悲观的原因：德国在工业创新和生产力领域均遥遥领先，扩展全球市场，积累资本，在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终结英国的霸主地位。在当时仍是基础产业的钢铁业，德国的优势渐增；在化学工业这样的前沿产业，德国占有绝对优势，进而基本上保证了德国在其他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包括新兴起电力工业：在哥德尔明，英国虽然在1881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组公共电力供应系统，但是英国人建造的只是附近河流上脆弱的水轮——交流发电机却是由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制造的。

英国已经失去了赶上德国的希望。英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由于教育程度太低而无法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科学和大多数学术领域不断取得进步的一直是德国的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美国的访问学者在牛津和剑桥享受着优雅晚餐和

〔美〕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酒水而只能通过抄袭德国大学的成果才能取得学位)。而且在时常爆发阶级战争的英国煤矿和工厂,工会强烈反对使用任何节约劳动力的新型机器和技术,其实是在反对一切的创新。德国工人则获得了更多的保障。他们刚刚享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养老和伤残抚恤金制度,以及健康和意外保险,此外他们的雇主大多数就住在附近,不愿意看到他们家的玻璃被愤怒的工人砸破,而不像那些英国权贵一样住在遥远豪宅里。

除了这些具体原因之外,德国的整个体制——“柏林共识”——也日渐显示其优越之处,它的确比英国式的自由放任更有效率。两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德国皇帝领导下的行政机关掌握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不仅能够有效地遏制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抗,而且能够用来组织大规模创新。成果之一便是注定会被全世界效仿的养老金制度,另一项成果是在新统一的德国拥有更高效的铁路网,相比之下有120家铁路公司的英国则混乱不堪,导致伦敦到处都是彼此不相连的车站,甚至在同一个小镇上不同公司的铁路线也会有不同车站。集中化的趋势也在工业领域产生影响,有利于企业的强强联合,从而有能力为开拓全球市场和研发提供资金支持——这些企业至今仍在与众多美国同行竞争,但是其对手中已鲜有英国企业。

这些都意味着英国已经失去了避免其相对衰落的现实希望。德国在军事实力、文化吸引力等各方面建立起优势地位只是时间问题。德国海军也许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毕竟英国不仅拥有众多的战舰,还拥有遍布全球的加煤站网络。但是在许多产业领域,如同在文化领域一样,竞赛已经有了结果。在1900年,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德语知识,就基本上无法学习从化学到希腊诗歌等众多学科,而英语只有在学习……英国文学时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金融领域,更具活力的德国经济带来的增长更迅速的资本已经压倒了伦敦商业银行家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德国在管理英镑这一世界首要储备货币方面的系统化优势能够不时地“修正”黄金的价格。汉堡的沃伯格家族势必要取代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而德意志银行已经让英国的商业银行相形见绌,它在1914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任何一项对未来30年的现实主义预测都会认为,1920年的德国会在各个方面超越日趋老旧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水平、最好的大学、最富有的银行和由当时完备的福利制度保障下的最和谐的社会。

然而,1920年的德国被击败、摧毁并且在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注定要陷入灾难,1890年那些看起来如此触手可及的希望统统都破灭了。英国的统治者当然也为他们的巨大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们无疑成功地扭转了未来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延续了不列颠的大国地位。事实上,正是德国的傲慢和战略无能——战术天才常常会犯的两个错误——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自威廉二世以来,许多德国人似乎就

许多德国人似乎就在为他们的快速崛起而疯狂。

在为他们快速崛起而疯狂，而英国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也不可低估。

在1890年，英国仍然深陷与法国在非洲、与俄国在中亚的殖民地争夺——他们是英国的头号 and 二号敌人。这使得英国不可能对付德国，即使在德国人准备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时候，英国的皇家海军仍然在保护其全球商业利益。

然而在接下来的15年内，英国实现了全面的外交革命，在摩洛哥的进入权、纽芬兰的捕鱼权、中西部非洲的据点、暹罗帝国的边界、马达加斯加的贸易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瓦努阿图）等这些问题上向法国做出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尽管面临国内对于俄国沙皇独裁统治的反对，英国在中亚问题上还是与俄国达成谅解。

最后的结果是，英、法、俄等国协调起来，联合抵制德国。在远东，俄国正准备同日本开战，但是英国人已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这是第一个真正平等的欧亚同盟并且获得了十分密切的海军合作的保障，从而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德日同盟的任何可能性。最后，英国人很好地控制了与美国所有的争论，包括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不计一切代价保持与美国人的良好关系是英国的既定外交原则，以备不时之需。

德国仅有的盟国与其说是能够为其所用，不如说更仰仗其所助：奥匈帝国虽然有点力量（包括一支有用的亚得里亚海舰队），但是无可救药地陷入了民族主义的纷争；虚弱的保加利亚被充满仇恨的敌人重重围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世俗现代化改革者无法在根本上克服伊斯兰的反现代化回潮，这个国家也处于民族分裂之中。而且与土耳其的结盟必然导致意大利的敌对——这两个国家在1911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陆地上意大利并不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是它能轻而易举地利用其在上亚得里亚海的锚地封锁奥地利海军，解除了英国舰队在地中海的任何威胁。因此，英国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与意大利搞好外交关系，并最终在1915年得到了期望的结果。

一旦双方实际的和潜在的盟友都被动员起来，两大集团之间注定要发动全面战争。最迟到1914年8月，一个具有战略思维能力的德国政府应该已经认识到，在战术和作战上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的德国陆军也无法挽救失败的结局。英国、法国和日本的舰队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各大洋，因此即使德国陆军赢得每一场战役、征服任何方向，德国依然会遭到封锁，被切断原材料必需品的供应，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被缓慢的经济消耗拖垮——不管新加入的美国军队会不会再赶来给予其最后一击。

战术很重要，但更高的战争作战层次艺术支配着战术，包含了地理因素的战役层次又支配着作战，因此英法之间34公里的海域、中国与俄罗斯的巨大地理纵深足以抵消入侵者的绝大部分力量。然而最终结果只能取决于更高乃至最高层次的大战略，其中所有的军事要素都被同盟的强弱、国家动员工业和总体经济的

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政治凝聚力和领导力所支配。在大战略的层次之下,所有战斗的胜败都只是阶段性的结果,其影响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暂时的。1914年即便是拥有巨大恢复力和战斗力的德国陆军也无法通过取得所有低层次的胜利而累积出大战略的成功——其所有的战斗最终都将付诸东流,无论这支军队是最好的还是最差的,结果都一样。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德国非军事的优势才真正具有价值。只要和平得以维护,德国的银行、工厂和大学就可以没有限制地不断成长,扩展其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影响,就像在1914年前确实发生的那样。这才是德国真正的比较优势,因为后者始终是相对的而从来不是绝对的。

但是,在1914年已经彻底包围了德国的英、法、俄同盟是什么情况?难道德国人不需要一支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来保护自己吗?毫无疑问,英、法、俄各有其实力,但是它们的联盟根本谈不上稳固——只是基于法俄对德国陆军的恐惧而得以维持。如果在1914年8月的危机中,德国削减常备军而不是动员预备军,法兰西共和国也许就无法长时间保持动员状态,也不会勉为其难地维持与沙皇独裁者的同盟关系。而沙皇宫廷中反对战争,或者更准确说亲德的派系可能会赢得胜利,使得英国统治者失去共同抵制德国的盟国。在英国国内也有反对不断增加海军军费的声音,如果德国也能停止其海军扩张,那么英国议会中支持海军建设和反对德国的政策就会崩溃。这些措施并不是要解除德国的武装,一支削减到无力进行大规模侵略的军队依然能击败入侵、保卫其全部领土,甚至包括遭到躁动不安的波兰人威胁的东普鲁士地区。

回顾历史,结论似乎十分明显:只有军事上不具有威胁性、外交上安抚他国的大战略才能拯救德意志帝国免于毁灭,通过加速自身的和平崛起,达到文化繁荣的新高度——事实上直到1890年还在担任首相的俾斯麦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在1914年,这个最佳选项由于情感的、智力的和官僚主义的原因而变得不可思议。经过多年的必胜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熏陶,在1914年,在情感上指望德国突然转变其骄傲自大、炫耀武力和出言不逊的态度是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在官僚系统中,享有尊贵地位的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甚至不惜诉诸包括武装政变在内的各种手段来阻止去军事化。德国没能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来自智慧——战略自身的艰深逻辑。这是一个直接违背常识的逻辑,因为它总是自相矛盾,真理被包裹在各种矛盾中。仅从战略上讲,比如,一支弱小的陆军和海军会比强大的更好,因为强大的军队可能会超出整个系统的承受极限从而激起过度的敌对反应。力量越来越大,系统极限反而会越来越

只要和平得以维护,德国的银行、工厂和大学就可以没有限制地不断成长,扩展其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影响,这才是德国真正的比较优势。

军事上不具有威胁性、外交上安抚他国的大战略通过加速自身的和平崛起,达到文化繁荣的新高度。

德国没能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来自智慧——战略自身的艰深逻辑。

低，当邻国开始警惕起来，从前的友好国变成了中立国、中立国变成了敌对国，敌对国被迫搁置彼此的分歧以联合对抗这个过度崛起国家的崛起。

二、现实的选择：中国的情况

每个国家和每个历史时期都各有不同，这使得多数类推都站不住脚，但是战略的自相矛盾逻辑总是一样的——因此，尽管克劳塞维茨和孙子在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上都相距甚远，但他们为战争开出的制胜方法是一样的。根据这个逻辑，由于崛起国家会激起更多的抵制，在大战略层面上，中国甚至可能反而因为其实力增长而被削弱，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结果。如果中国的力量崛起被更加温和、谦逊的外交政策相抵消，其结果不能避免的话，至少可以得到调和。这个自相矛盾的逻辑与常识和人类的自觉相悖，因为在力量增长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加谦卑是不自然的；在财富和军力增长很容易的情况下，裁军也是根本违背常理的。因此，战略上这种自相矛盾的和违背自然的逻辑往往会被忽略而不是被遵守，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会在如此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罪恶和愚蠢的记录。

然而直到2008年，中国的对外表现却很大程度地符合这个“不自然”的悖论逻辑，正如中国在领土争端上的行为细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¹ 在1960—1965年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朝鲜、蒙古、阿富汗分别签订边界条约，在有争议领土上中方对各国分别做出82%、94%、60%、65%和100%的让步。1998年，当时中国的情况远远好于老挝和越南，但仍分别以76%和50%的让步为代价和老挝、越南签署了关于争议领土的条约。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于1994年签署边界协定（让步66%）、与吉尔吉斯斯坦于1996年签订（让步68%）、与越南在1999年签订（让步50%），以及与塔吉克斯坦于1999年签订（让步96%）边界协定。

这似乎表明，随着其相对实力的增长，中国更加愿意做出妥协。与陆地实力相比，中国的海上实力比不上其在陆地上的优势，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上却至今不能解决争端。尽管在1993年和1996年与印度签署了协定来搁置分歧以便寻求其他领域的合作，但是两国的领土争端也没有解决；中日在处理两国间的海洋争端时在技术上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与中国总体上的“和平崛起”（后来换为“和平发展”这一更温和的说法）²的大战略是一致的，其目的很明显在于消弭抵制对手之间的联合。

然而在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其原因可能是西方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排名突然上升，危机还似乎证实了中国的实践经验

1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ssim; and summary: Table 1.3 pp.46-47

2 First enunciated by Zheng Bijian in 2004 at the Bo'ao Forum and more fully explained in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05, as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北京共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声望。除了简单的自大情绪,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目了然的:自信的声明、讽刺的反驳、严厉的警告在中国官员新近对国际问题的评论中变得更加普遍,中国人更多地讨论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印度和日本之间潜伏着的领土争端突然复苏,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在海洋领土上的争端也活跃起来。在领土问题上,中国外交表现得非常坚决,在与日本的海上突发事件中以日本的尴尬退让收场,但是由于中国外交部后续不断地要求道歉和赔偿,这一事件对日本公众舆论的影响被放大了。与所有的历史经验相悖,人们似乎认为这种行为不会有长期的后果,认为突发事件很容易会被遗忘,强力手段的后遗症会被随后某一天的和谐峰会所消除。其实这只是错觉。

这种背景下,从历史和法律角度争议对与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战略上的后果:至少在当前,2011年的1月,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其他各个国家的民众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不再那么平和,而是充满了担忧、焦虑,甚至是警惕。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政府比从前更加警觉,更加关注安全而不再是贸易。一些国家无论程度如何,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印度、日本和越南一旦联合起来,将在总人口、经济总量和技术总水平上超越中国。当然,这在战略上还没有到重要的程度,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三方联盟的影子,政治上也并不可行。

如此联盟也没有必要。这三个国家最近都与美国加强了关系,这并非巧合,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悉心建设、耐心维护和温和领导多边联盟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才能。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联盟无疑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多边联盟,它依靠北约的常备军执行军事行动。在亚洲还不太可能出现一个与之比肩的多边联盟,恐怕这种联盟不是必需的,也不可行。单纯的双边安排已经足够,而且还可以允许其他国家加入,首先将韩国纳入其中。

进而言之,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英国不得不在殖民地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以达成与法国在1904年的“谅解”结盟,而美国不用牺牲任何利益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个最终会针对中国的联盟中取得非正式领导权(当然还完全没有公开宣称针对中国),它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包括澳大利亚也绝对会加入。

美国不用牺牲任何利益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个最终会针对中国的联盟中取得非正式领导权。

为了对抗这样一个不依靠强制力而发挥作用的广泛的联盟——这是对任何联盟而言都是非常罕见的优点——中国只有一个确定的盟友:巴基斯坦,一个民族分裂状况如奥匈帝国般严重的国家。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伊朗——如果仍在当前政府统治下——也很可能纯粹出于反美主义而聚集到中国一

边，而他们当中只有厄瓜多尔是太平洋国家，且无足轻重。

只有俄罗斯加入中国一方才会产生战略性的影响。莫斯科将会作为全球外交的焦点和各国争取的对象。

只有俄罗斯加入中国一方才会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如果中国的行动继续按照其2008年后的道路进行，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反对中国联盟的产生，莫斯科将会作为全球外交的焦点和各国争取的对象脱颖而出——甚至会更重要，因为俄罗斯会一并带上它的中亚盟友们。

只要西方继续刁难俄罗斯政府，中国就有很大胜算能够争取到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萎靡而小心的邻居。而在另一阵营里的印度可能握着成功的钥匙，因为印度历任政府均明智而坚决地拒绝在亲美的同时，放弃与俄罗斯的长期联系，以及两国在军事和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在印度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以补充欧洲和以色列供应下降的同时，印俄之间军事航空业的交易也在扩大。印度为此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在战略上是一笔精妙的投资，因为以生产多功能苏霍伊重型战斗机后续型号为起点的联合生产体系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给第三方。

2011年的国家没有变得更加谨慎，核威慑成为核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最大威慑力量。

当然，现在的大国间战略联盟的意义与1914年时已大不相同。那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协定，盟国间相互承诺在战争中动员和部署战斗力量。它们完全机械式的互动可能破坏政治家们防止战争的谨慎努力。2011年的国家没有变得更加谨慎，核威慑成为核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最大威慑力量，实际上阻止了任何摩擦冲突的升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只是军事计划的一个理论终点，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前景。

因此，当今对联盟功能的定位不是联合作战力量及协调计划来准备战争，而是相反，为了通过在盟国与盟国之间传递威慑能力来更广泛地阻止战争。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一方的任何双边危机会演变成另一方的多边问题，扩大了危机的维度，以及对更广泛的相关国家的影响。因此，即使战争的可能性被排除或者更加地不现实，危机可以被当做不重要的插曲而处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担忧那些由于自身过于傲慢的举动和过快军力增长而催生出来的联盟。因为战略联盟当然也会影响非军事的关系，会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影响国际贸易。如果敌对的集团出现，集团间的贸易必然要受到限制，尤其是两用品设备和技术交流。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正如现在一些中国制造的民用通信设备有时会因为安全理由而被拒绝。当事态演变到全面对抗的时候，就会导致公开的多边贸易禁运，就如“冷战”替代了真正的战争。

暂不考虑物质后果，战略关系的恶化带来观感上的后果对双方的人民而言代价已经非常高昂。日常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将会减少或者被各种方式扭曲，使得自1976年中国回归国际社会以来逐渐繁荣起来的大量个人、家庭、机构、社会和国家关系走向衰落。目前尚不明显的多边斗争会放大到对整个世界

破坏，而对尚在崛起中的中国损害更大。

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除非中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聚合起一个导向自己的具有压倒性实力的全球联盟，中国当前在最高层次上的大战略最佳选择只有放下自己在外交立场上的傲慢态度，无论是在领土争端上还是在其他事务上，还要果断地放缓军事增长的步伐。

军事力量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自身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现实的、物质的军事力量的建设，毕竟其规模还不是毫无节制，而是因为伴随而来的具有高度挑衅性的炫耀。在2008年的转折出现之前，2007年1月19日，中国用弹道导弹击毁了一颗在轨运行的中国卫星。这不是一项新能力，但是它令所有使用卫星的国家感到不安，而且产生了具有危害性的太空碎片的散落。最近的炫耀看起来则是有意在向中国的邻国发出警告：J—20战斗轰炸机照片的泄露，其超现代的外观意味着它有较强的隐身效果，其庞大的尺寸大大超过美国的F—22战斗机（已经由于“太强劲”而停产），其巨大内部弹仓暗示了打击的能力。也许还需要多年时间来为J—20打造有效率的发动机和先进的航电设备使其能用于战斗，但是仅仅将飞机停在成都的机场而且毫无遮盖已经达到了一个效果：中国的邻国又增加了一个理由来担心其军事增长，又增加了一个理由来结成敌对联盟。这被看做对中国的总体利益有利，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原因仍然不得而知。

也许中国的领导人可以克制住强烈的情感冲动和强大的部门利益，使其政策服从铁的战略逻辑，采纳了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不自然”的外交姿态。这也许只是错觉，但这样做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正如中国在许多和平目标上的比较优势一样显著——但是采取符合逻辑的战略行动并不容易，事实上必须要完成很多困难的事情。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采取更温和、友善的语言和态度会比傲慢更有帮助，但是也不足以阻止已在筹备中的敌对势力的联合。通过以互惠性和条件性为前提的正常的外交谈判恐怕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争端——这样做可能会制造出更多争端。唯一的选项只有像过去那样通过中国的妥协暂且搁置无法解决的争端，或者把它们交给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自行倡议建立一套有效力的仲裁机制，以一种非常不具有挑衅性的方式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这也许也是传播“仁”的思想的好机会。

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自行倡议建立一套有效力的仲裁机制，以一种非常不具有挑衅性的方式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这也许也是传播“仁”的思想的好机会。

在所有可能的困难中，最困难的是单方面设定对武装的限制，在保持核威慑和对国土安全的“防御优先”的能力的同时，削减更具进攻性的军事能力，甚至要削减那些只在作战层面而不在战略层面有侵犯性的能力。从军事上讲，这是退步，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会令那些怀有可被理解的但不一定合理的军事抱负的人感到失望。但是只有退却的军事政策、安抚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平衡中

国的经济和技术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得中国不超出整个体系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中国遵循传统路径，在各个方面都突飞猛进，并期待一切在最终都会圆满解决，这当然更自然，政治上也极其容易。但是战略的逻辑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于那些只会期望好结果发生，而不去采取行动避免坏结果的人而言，这是残酷的。

（张雅霖 译；余万里 校）